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

(二)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

第二辑

赵景深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4153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24153

DC64/32
DC64/23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第二辑)

目 录

戏曲研究

一部深刻的社会悲剧

——谈《琵琶记》 赵景深 江巨荣 1

南戏四考 刘念兹 28

从南戏到弋阳腔

——《弋阳腔史考略》之一 流沙 47

读《杀狗记》杂记 李平 88

《大元天历间九宫十三调谱》残曲初探

..... 彭飞 朱建明 117

关于散曲《上高监司》 孟繁仁 134

试论明清传奇副末开场 徐扶明 140

《鸣凤记》札记 冯沅君遗作 158

唐英和他的《灯月闲情》 周妙中 164

《灵台小补》(《梨园粗论》)作者金连凯考 颜长珂 173

庄逢吉和抄本《秣陵秋》传奇 车锡伦 190

译著

从《梧桐雨》到《墙头马上》

..... (日)金文京著 骆玉明节译 194

《灯花婆婆》话本考 (日)堀诚著 徐允平译 213

小说研究

- 唐代传奇《聂隐娘》、《虬髯客》作者辨 李宗为 229
从《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谈起
——“变”文疑义新探 赵昌平 242
- ✓ “冤狱和清官”的文艺
——宋元俗文学介绍之一 邵曾祺 255
《杂纂》探讨 曲彦斌 275
吴月娘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与朱星先生商榷 黄立新 293
论《醒世姻缘传》 应必诚 306
试述蒲松龄的创作个性 蔡国梁 327
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李梦生 343

资料

洪昇《集外集》

- 诗文辑佚(上) 刘 辉 刘世德 365

一部深刻的社会悲剧

——谈《琵琶记》

赵景深 江巨荣

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得很早、很广。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唱蔡中郎。”这是南宋以盲词普遍传唱赵蔡故事的明证。徐渭《南词叙录》在“宋元旧篇”《蔡二郎赵贞女》名下注云：“……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这又是宋元以来，以戏文广泛搬演的证据。可是，无论盲词也好，戏文也好，这些民间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今天能看到的，则是经过高则诚加工修改，甚至是再创作的《忠孝蔡伯喈①琵琶记》，简称《琵琶记》。

高明，字则诚，元末明初人，约生于1301年，卒于1371年。他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浙江永嘉。早年跟从元代名儒黄溍学习，专攻《春秋》。举进士，历任处州录事、绍兴府判官、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推官等职，任内，曾与元统治者进行过斗争，甚至“以论不合，避不治文书②。”他不满于元人暴政，曾平反冤狱多起，史称“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郡称为神③。”方国珍曾强欲留幕下，则诚即解官，寓鄞县栎社，以词曲自娱。朱元璋即位，使使者征之，则诚以心疾辞，佯狂不出，以了一生。

《雕邱杂录》云：“高则诚作《琵琶记》，闭阁谢客，极力苦心

歌咏，久则吐涎沫不绝，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从中可以看出高则诚惨淡经营的情况。经他改编的《琵琶记》，戏剧情节更为凝炼、集中，矛盾冲突转向双线发展。语言上，既充分汲取了民间语言的本色特征，又结合人物的不同身份和环境，采用了典雅、清丽、沉郁等不同的风格，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内容上变动更大，民间戏文的蔡伯喈是一个不忠不孝、背妇弃亲最后被暴雷震死的人物，而高则诚则把他改为由于环境所逼实则时刻想孝顺父母和怀念发妻的全忠全孝的人物，最后还得到了大团圆的结果。整个作品都以忠孝相标榜。“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剧本的题目就是宗旨所在。剧本的唱词与宾白，也有很多忠孝的说教，最后的天子封诰更表现了对忠孝的推崇和赞赏。总之“忠”和“孝”（主要指孝）成了《琵琶记》的主旋律，《琵琶记》就象一本封建伦理的教科书。

“忠”和“孝”这些封建伦理，人们都知道这是愚民政策的产物，是维护封建剥削阶级暴虐统治的工具，它充满着黑暗与虚伪。可是，数百年来，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对如此以封建道德相标榜的戏剧却并不排斥，不仅明清两代历演不衰，直到近代，川剧、湘剧、梨园戏、昆剧、绍兴高腔这些大剧种，也按高氏原本搬演，而且观众常常为之一洒同情之泪，评论中也多认为它是一出“从人心流出”，“真堪断肠”^④的戏曲。这是为什么呢？

看来，《琵琶记》自有它吸引广大观众的地方。从思想内容看，它通过赵五娘和蔡伯喈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封建制度、科举制度下，劳动妇女和下层知识分子一种共同性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人们对他们的遭遇所引起的共鸣和对正当的、合乎情理的道德行为的期望。同时，它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起码的生活要求的蹂躏和善良的生活愿望的摧残，揭露了这种社会悲剧产生的根源。本文拟就作品主要人物形象所体现的道德行为的实际

内容，来分析《琵琶记》的思想意义。

赵五娘：年轻的农村妇女一种共同的悲剧

赵五娘是《琵琶记》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她的命运是一个悲剧。但是，她演出的是一出什么样的悲剧呢？是古代年轻的、贫苦的农村妇女不幸遭遇的悲剧，还是貌似劳动妇女而实质上却是封建阶级道德观念化身的妇女的悲剧？是劳动人民合理的生活理想、愿望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被摧残的悲剧，还是封建道德伦理破灭的悲剧？这是评价赵五娘形象意义的关键所在，也是评价《琵琶记》的主要基础。

从赵五娘对待封建传统观念、对待忠孝道德的态度看，她是时时令人失望的。例如，在新婚生活的日子里，她就以传统的封建思想来理解婚后生活的内容，说：“怕难主萃繁，不堪侍奉箕帚。^⑥”把自己当作丈夫的附庸，把婚姻看作家族的延续。蔡伯喈被逼试上京，眼看着天涯海角，恩情断绝，这时五娘却“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意牵？”表现为对爱情的冷漠与麻木。等到伯喈离家，生活的重担已加到这个孤弱的乡村妇女身上时，她更明确地说：“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骨头葬处任他流血好，此唤作骨血之亲，也教人称道。教人道：赵五娘亲行孝。”从上述思想表述看来，赵五娘既缺乏真实丰富的情感，又充塞着浓厚的封建意识。这样的人物形象理想的毁灭又有什么悲剧意义呢？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透过作品某些陈旧言语的帷幕，观察五娘内心的情感；如果我们注意我国古代妇女表达思想的特殊方式并注意戏剧表演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赵五娘并非是一个以封建妇道为行动准则的人，不是一个用封建教条在内心消灭个人情感的木偶。

这在赵五娘出场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作者给五娘出场安排了一个具有乡村风味和生活情趣的环境：那是一个小门深巷、帘幕风柔的农家，又是新婚燕尔、春意盎然的时刻。一家四口，二老康宁，夫妻和顺。展眼有排闼青山、护田绿水；生活虽清淡无华，却富有田园之乐。此时此际，这位农村妇女一登场就自然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最喜得今朝新酒熟，满目花开似绣。”这表现出她对明媚春光的惊喜和敏感。当丈夫让她一起举杯共祝父母高寿时，她自言自语：“深惭燕尔，持杯还觉娇羞。”表现出新妇的羞涩。尽管由于选取主题的原因，作者对她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充分展开，但如果考虑到导演和演员的再创作，即就她对青春、安定生活的热爱以及新妇的羞涩加以渲染，观众足以看到她虽然庄重但却活跃的个性，可以感受到农家妇女某些感情特色。

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在戏剧矛盾冲突中展现出来的。封建社会年青妇女封建伦理观念深浅的程度，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爱情这一问题上。封建伦理观念浓厚的人，以封建阶级所规定的妇德、妇容为准则，不能流露出任何感情色彩，只能象牛小姐那样：“无情何处管多情，任取春光自来去。”对自己的丈夫，唯有服从，以符合封建规范。赵五娘在短暂的宁静幸福后，即遇上了尖锐的矛盾：黄榜招贤，父亲逼试，懦弱的伯喈不得不奔波于仕宦之途。在夫妻分别的时候，五娘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但是，她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同一切妇女一样被剥夺了向亲人诉说内心情感的权力。明明是内心怀有深挚的爱，她却说：“奴只虑，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明明是自己不忍离别，却只能说：“何曾为着夫妻上意牵？”但是，她内心里想得很多：她想到六十日夫妻一旦抛弃，不知丈夫的前途如何？不知一朝登第后可能回家？不知十里红楼是否再娶娉婷？更不用说，新婚一别，一旦孤零，衾寒枕冷，洞房尘生，仅就感情上来说，她不象以妇德抑

制了个性的人那样驯服，更不象由封建闺训所薰陶出来的妇女那样企望丈夫去求取功名。她有着乡村妇女朴素的生活愿望和率直的性格。所以，她一则责问伯喈：“解元，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之夫妻；雪鬓霜鬟，更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再则而讥讽丈夫：“你读书思量要做状元，我只怕你学疏才短！”语气何等尖锐泼辣！她甚至还要拉着伯喈去同公公说理，行动又何等激切！这不是五娘为维护正当的合理的生活而进行斗争吗？

其实，作者为表现五娘内在的爱情深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台词和戏剧场景。我们看“南浦送别”这一幕时，仔细品味她唱的一支（江儿水）：

妾的衷肠事，万万千，说来又怕添萦绊。六十日夫妻恩情断，八十岁父母如何展？教我如何不怨？

八十岁的父母事，他们已谈得很多，她也用不着说而欲止，止而欲说。这里欲说不能的万万千千的“衷肠事”，实际上就是指的夫妻感情，离别的痛苦。只有这样的情感，才如千头万绪，诉说不尽。这是没有丝毫礼教色彩的、有血有肉的普通年青妇女的情感。

然而，他们终于不得不分离了。戏剧在这里展现了一段更动人的情景。这里，作者没有作累赘的科介说明，但唱词的动作性已经对人物的行动和内心作了细致的刻划。（鹧鸪天）一曲五娘唱道：

他那里，漫凝眸，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归家只恐伤亲意，阁泪汪汪不敢流。

多深沉，多真实。这说的是伯喈凝眸，实则是五娘凝眸；如五娘不凝眸，则不知伯喈凝眸。唱词写“马”几十步九回头，实则指伯喈十步九回头。伯喈十步九回头，实则是五娘全心所寄。曲

词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正因为五娘和伯喈的离别，充分表现了年轻夫妇被迫分离中的深挚而悲痛的感情，所以选取古代表述伤心离别的专门词语“南浦送别”作为戏剧场景，这很好地说明了《琵琶记》描写这种真实情感的深刻性和典型性。

很清楚，赵五娘有真挚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和自己的个性，在某种情况下，她甚至表现出年轻的农村妇女的大胆与泼辣。但是，时代决定她，不能把内心世界用明白的语言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也使他笔下的人物带有某种闺秀的色彩。因而，她必须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包裹在时代所允许的语言外衣里面。例如，即便是表示对新婚生活的满意，也要讲“甘奉箕帚”；即便为夫妻份上情意绵绵，也只能讲是为爹娘流泪。同理，为劝阻丈夫上京赶考，她也只好说：“只是孝经、曲礼，你早忘了一半。”只有这种话才是她可以说得出的理由。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种内容与形式、隐蔽与公开的矛盾，我们就没有理由一看到她口中出现伦理气味的词语就断言她是封建礼教的信奉者和实行者，没有理由用语义的分析来代替真实思想的分析。只有把握住古代妇女表达思想的时代局限，才可以体会到她这个数百年前的真实个性。

然而，关于赵五娘的不同评价主要不在这些地方，而在：如何看待伯喈离家以后她一系列行为的性质和思想基础。谁都知道，五娘的重头戏是从丈夫离家以后才开始的。作品着重写了她的生活发生突变以后，她怎样独自侍奉公婆，怎样在饥荒下挣扎，写五娘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祝发买葬”、“罗裙包土”等独特情节中，如何备受了超乎寻常的苦难。就在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环境中，作者表现了她坚韧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完成了五娘悲剧性格的创造。

这一系列行为的性质和动机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她如此任

劳任怨、舍己为人、勇于自我牺牲是在实践着封建道德的信条，还是表现了农村妇女为克服封建制度带来的苦难而进行坚韧不拔的努力？作者通过她是力图鼓吹一种抽象的道德，还是着重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矛盾？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能仅仅以她的言论为根据，而应该以她的行为作根据。我们不能满足于论定她的言论的抽象性质，而应该具体分析她的行为的实际社会内容。

我们知道，人类自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曾发生了一种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理性逐渐代替了本能，行为逐渐赋有了道德性。人类最早、最直接的关系，是进行生产和生活中的血缘关系；而且，劳动愈不发达，劳动产品的数量即社会财富愈受限制，早期社会的各种制度和伦理观念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因此，作为反映血缘关系的思想表现——包括孝养观念在内的家庭成员的互助观念，就是最早产生的道德之一。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便追述过史前时期，亲属团结互助的重要作用，我国早期思想家孔子、孟子所说的“孝悌”、“亲亲”、“亲仁”等道德观念，也都明显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可以说，初民的这种道德，不过反映了他们经济上和生活上的相互依存和互助的关系。孔子无非把生产力极端原始和低下状况下所形成的家族内部的自然依赖关系，转变成为一种心理的内在要求，并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尽管这些道德既被当时的统治者，也被以后的统治者利用过，但也毋庸否认，在氏族成员中，在几千年的民众之间，这种亲属依赖、互助的道德，也正是协调他们内在关系的一个有力因素。

如果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经济与生活上的依赖就显得没有必要，因而血缘关系就会削弱；这种关系一旦削弱到最低限度，那么这些道德也必将消亡或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无论是作为

《琵琶记》时代背景的汉代也好，无论是作者创作时的元明之际也好，都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而且，中国封建社会，又有得以凝固化的基础，如数千年基本相同的简陋的生产工具，个体、小农的生产方式，封闭性的自然经济形态等等，这都使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几乎始终陷在原始的生产水平之中。劳动者生产的产品除了统治阶级攫取的部分以外，已经无法满足生产者的直接需要。在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平上，家庭成员之间不能不继续着历史形成的互助和依赖关系，其中包括后辈对前辈的孝养关系。这证明，正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延续性，影响了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延续性。

赵五娘的种种悲惨遭遇便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既然在上述道德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已经说明，这种道德观念本身，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有着具体的社会内容；《琵琶记》写的是感性的人物形象，它的道德行为也就更有具体性的特点。

作品告诉读者，赵五娘生活在一个清贫的小农人家，没有家产，没有其它的劳动力，只有一对青年人，侍养着八旬的父母。蔡母说：“家私空又空”，点出了家境贫寒的状况。这样的家庭自然经不住微小的动荡和变故，一点小风浪都可能把这只小船颠覆。你看，东村李员外，因为要儿子上京考试，结果是儿子流落长安，父母做了乞丐头目，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这也反映了小农家庭经不住动荡的普遍性。就在这种状况下，风浪开始向五娘袭来：黄榜招贤，蔡公逼试，伯喈出走。生活的重担将全部压在五娘身上。五娘如何办呢？撒手不管，谁管？交给别人又有谁可交？只有五娘独自承担。客观环境已如此决定了她的责任。她在考虑着现实的生活问题。“我的埋怨怎尽言，我的一身难上难。”这一身之“难上难”，就是指只身挑起生活重担之艰难。五娘的家庭地位，使她比谁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今后的责任，认识

到生活问题将是她面临到的最直接、最尖锐、最严重的现实问题。虽然如此，五娘还是勉力地承担下来了，她决心“尽心竭力，朝夕奉养。”这是五娘的可敬之处，人们称它为“孝”。这种举动有多少伦理气味呢？很少。实际上，这不过是劳动人民出于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去解决生活矛盾的一种办法，是人物形象的现实品格的表现。

因此，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一切超乎人情事理之外的矫揉造作，都没有在五娘的行为上留下痕迹。她对待的是家庭的现实矛盾，所以那些举动都可感、可信，具有现实的具体性。

我们看到，伯喈刚离开，这个家庭还没有遭到意外的冲击时，眼前的矛盾，主要是公婆过老。解决的办法，是五娘必需在饮食起居方面予以照顾。五娘是不是这样做的？作品有概括的描写。

〔风云会四朝元〕轻移莲步，堂前问舅姑。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要行须与扶。奈西山景暮，奈西山景暮，教我请着谁人，传语我的儿夫……

这是五娘对自己这一段奉养生活的综合。她所做的，照字面看来，就是送饭、补衣、搀扶；概括说来，便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为老人解决起码的困难。这些都是百姓家庭日常必需之事，是小生产者在极端低下的生活条件下，家族内部所尽的一种互助的义务。它的目的，在维持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细胞的生存，而不是维护封建秩序和礼教。它也不带多少封建性。

不久，更严重的灾祸降临到五娘身上，陈留郡遇到了饥荒。三年灾荒，到处是“子忍饥，妻忍寒，痛苦声，恁哀怨”。它给五娘一家带来的也正是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五娘以最大的坚韧精神和牺牲精神寻求和采取着可能的实际步骤。荒年一到，五娘别无力量可以获得粮食，她首先便想到把自

已的钗梳、首饰、衣衫之类拿去典卖，换回一点口粮以便全家充饥。听说义仓赈济，老父母出不了门，她又不惜抛头露面，苦苦挣扎到义仓前乞讨。在最困难的时候，张太公来救济他们，谁知婆婆捱不住，挑剔饭菜，五娘只好把米饭留给公婆，自己背地里糟糠自咽。然而祸不单行，灾难重至，三年饥荒，终于吞噬了二老的性命。这时五娘早已是“衣衫都典尽，首饰并没分文”，身上惟有青丝一缕，尚可换钱来为老人买葬。她不忍老人暴尸于野，故以青丝为意，沿街乞讨。最后，她得到张太公资助的棺木，自己既无力量安葬，而且“又无钱雇人，又无人得央靠。”只得自己十爪抓泥，罗裙包土。这一系列情节十分具体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村破败的实际，也十分深刻地反映了那些坚韧的农村妇女为克服社会和自然的灾难在进行着怎样艰苦的奋斗。

应该特别指出，赵五娘的这些举动都是由客观情势决定的。饥荒来临的时候，她有几句独白，说：“奴家自从儿夫出去，遭此饥荒；况兼公婆年老，朝不保夕，教奴家独自，如何区处？”的确，既然年老公婆“口食身衣只问奴”，不承担这一责任又“如何区处”呢？所以，她说，这是“路当险处难回避，事到头来不自由”，然后才出现了许多被称为孝的举动。说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客观环境决定着她的行动，她尔后的一举一动并不是从统治阶级宣传的“孝”的说教出发，或者以“孝道”、“妇道”为标准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追求做封建道德的完人。她的那些行为，正是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崇高的舍己为人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她不曾意识到的本阶级成员之间的关怀与互助。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听五娘说：“媳妇本是亲儿女，劳役本分当为。”这多么真实地反映了某些小农之家亲属之间的深厚关系。我们听她的自白：“非奴苦要孝名传，正是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真切地表明了她的心迹，并且恰恰表明了她与孝道的距离。

因此，赵五娘的悲剧，不是孝的悲剧，而是我国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悲剧。它既是封建科举制度下，一个富于情感、具有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年青农村妇女被剥夺了应享有的生活权利的悲剧；同时，它又是一个贫苦的乡村妇女，为控诉不合理的制度给自己及其亲属所带来的苦难而作出巨大自我牺牲的悲剧，是漫长的人类生产和斗争的历史所形成、而为劳动人民所具有的团结互助、舍己为人、任劳任怨的高尚品质被摧残的悲剧。

古代封建制度始终在这样或那样地威胁着下层人民的生存，原始的生产方式、极端低下的生产力，也始终把他们置于自然力的无情打击之下，制度与自然力之间，风助火威，火借风势，不断造成各种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悲剧。遭受着或可能遭受着种种不同悲剧命运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自然以深厚的同情理解赵五娘的遭遇，关怀着她的命运。在各种悲剧命运中，象赵五娘那样品德高尚、意志坚韧而命运如此悲惨的女性，并不多见；象《琵琶记》这样描写千百万观众最熟知的农村，反映农村妇女受到政治制度和生活上的全面打击的作品，也不多见。因此，赵五娘就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妇女的不幸，她也就更强烈、更深刻地为千百万妇女倾吐了她们的痛苦。当五娘唱道：

〔山坡羊〕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绪。
骨崖崖难扶持的病体，战钦钦难过的时和岁。

× × × ×

〔香柳娘〕看青丝细发，剪来堪爱，如何卖也没人买？若论这饥荒死丧，怎教我女裙钗，当得这狼狈？况我连朝受馁，我的脚儿怎抬？其实难挨。

如此等等。这就不是她个人的不幸命运，而是广大贫苦妇女的共同命运。因为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基础长期存在，所以赵五娘的悲剧或类似的悲剧便经常发生，这便是《琵琶记》能够长期

搬演而仍有感染力的原因所在。

因而，尽管《琵琶记》以“全贞全烈”、“孝道”、“妇道”等封建性的道德来赞美赵五娘，但是，因为作品并没有停留在空洞的道德说教上，它反映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真实矛盾，描绘的是一个贫苦妇女的真实的命运，赞美的是她在那些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高尚品德，这对我国观众来说，特别是对处于类似悲剧环境中的妇女说来，那已经象是在诉说她们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肯定她们自己的行为，简直谈不上有多少封建的说教气味了。

蔡伯喈：善良而懦弱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

蔡伯喈是《琵琶记》中更为复杂的悲剧人物。一方面，因为父母年老，立志克尽为子之道，以侍奉老人；另一方面，做了官后，又没有抚养双亲，结果使他们活活饿死病死。一方面，他对糟糠之妻怀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娶了牛小姐为妻，使五娘历尽了艰辛。一方面，他对逼试、逼婚和强为议郎都表现过强烈的不满，并进行过抗争；但另一方面又还是去考了状元，就了新婚，立于朝班，一一入了彀中，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凡此等等，真是既可怜，又可恨；既善良，又懦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个性？这是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个性，是那些从贫苦的农家出身，尚没有被封建教条灭尽劳动人民的道德的士人的个性。作品表现的，就是这些士人身上保存着的善良愿望、正直品质在现实生活中被封建制度的岩石砸得粉碎的悲剧。

关于蔡伯喈的社会地位，和由此而决定的他的基本思想特征，作品一开始就作了清楚地交代。它告诉观众，蔡伯喈是出身于贫苦、清寒农家的一介书生。他生在被称为离京万里的荒僻

山村，父母务农，从小在“小门深巷”过着“黄卷青灯”的生活。这样的环境养成了他对乡土、父母的深厚感情，所以在家的时候，颇能“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表现了一个农家子弟的质朴。在夫妇生活上，他也没有沾上统治阶级的习气。他不因五娘没有桃李之姿而嫌弃她，恰恰相反，他心中正把五娘视为“自家骨肉”。这表现了他们在这个质朴的小家庭里所建立的感情的自然和真挚。可以看出，从作品的开始，作者强调了男主人公在农村环境中形成的朴素品质，表现他对这种生活的满足。蔡伯喈唱道：“不谬，更清淡安闲，乐事如今谁更有？”“真乐在田园，何必当公与侯？”这样的生活理想，虽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政治内容，但却也反映了下层民众生活观念的自然性与合理性。

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如果象古代大多数青年农民一样，不能读书，他也许会演出另一种社会矛盾的悲剧而不是现在的悲剧了。但他偏又有才有学。十载青灯下，他“沉酣六籍，贯穿百家。自礼乐名物，以至诗赋词章，皆能穷其妙；由阴阳星历以至声音书数，靡不极其精”。成为一个饱有知识的书生。这便种下了打破伯喈原有的生活美梦的祸根。在四口之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朝廷招贤，郡守荐举，皂吏催逼，父亲要儿子光宗耀祖，好心的邻居也以“学成文武艺，合当货于帝王家”相劝，他们抓着、拉着、推搡着，把伯喈送到悲剧的路上去了。

这是伯喈碰到的第一个矛盾。他一下就碰到君权、父权的大岩石。在突然到来的打击面前，他不满、挣扎、试图逃避。但他又经不住外力的威逼，又顺从、退让，走上封建势力给知识分子规定的路。

虽然，在这种矛盾中，我们看见了伯喈复杂的性格，但是从这一矛盾的内容来看，它在实际上只不过是伯喈能不能尽孝以及如何尽孝的问题。伯喈不愿离家，除了五娘的因素外，主要顾